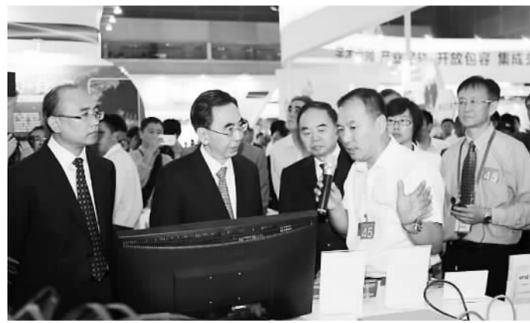


# 科技“年度大集” 培育投资沃土 高交会，让创新精神闪耀

杨世国 程全兵 王俊岭



图为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左二)和深圳市市长许勤(左一)在听取项目介绍。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每个深圳人都知道，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荣。2015年11月16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下简称“高交会”)再一次如约而至。据悉，第17届高交会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主题，主要展现中国自主创新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发挥高交会助推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政、产、学、研、资”有机结合。今年，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代表团、3000多家参展商、1万多个项目参加展示、交易和洽谈。有分析人士指出，深圳对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产业交易会十多年的执着，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展翅翱翔的重要原因之一。

## “荔枝节”变成“高交会”

上世纪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深圳当时原有的人口红利也正在消失，深圳正在“三来一补”增长乏力的路口徘徊，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原来每年一届的“荔枝节”，也在这个当口被改为了“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而正是这一“改”，为深圳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高交会究竟有哪些故事呢？一个经典的案例便是如今的互联网大佬马化腾。有一个时期，马化腾曾经四处奔波，甚至一度要卖掉QQ，但首届高交会上的一笔风险投资，却救活了这只“小企鹅”，而如今的腾讯，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地标”。事实上，像腾讯这样在高交会获得市场、资金或科研成果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圳自主创新的“家底”也越来越厚实。达实智能、云米网络、金蝶、比亚迪、大族激光、三诺、研祥等一大批企业从高交会走出，成为中国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创新资源，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高交会与高新技术产值增长周期的关系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1990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有几十亿元；到2000年，超过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10余年的时间；而2003年超过第二个1000亿元时，用了3年时间；之后，就以平均每年一个“千亿级”的速度在增长；到2014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1.5万亿元。

## 小产品登上大舞台

当然，高交会的故事远不止马化腾一位，众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产品亦从这里走出。有观察人士戏称，看高交会的产品变迁，就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变迁。例如，人们司空见惯的U盘，就是从高交会走向世界的。1999年，邓国



图为“一带一路”展区前人头攒动。

顺和同伴成晓华发明了全球第一款闪存盘(即U盘)，并把它带入高交会上一个小展台，结果成就了后来风云全球的朗科。2006年，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在高交会上预言：不出10年，智能机器人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当时此言被人们认为是“吹牛”。如今8年过去了，扫地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智能玩具机器人等，都已经进入了市场。

17年来，研发机构与企业在高交会上达成数百项合作，如转基因抗虫棉、地效飞行器等一批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项目，均走上了产业化之路并打入国际市场。事实上，智能手机、家用机器人、物联网，以及时下最新潮的可穿戴设备、云计算、光子支付等，都是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进而大规模应用铺开的。

“如果你有一项发明，那么就应当跑出来参加高交会；如果你是一家很想尽快有所作为的科技企业，那么就应当在每一届的高交会上有所作为。”一位参会企业家的肺腑之言，道出了高交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上的重要意义。太空科技南方中心主任周路明，曾担任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工程部部长。



图为科技名企“集结”高交会现场。

长。当时他曾这样分析：中国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北方和高校集中的地区，深圳在科研上可谓“一穷二白”，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对科技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科研院所又有大批科技成果亟须产业化。高交会的出现，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愁嫁女”变身“万人迷”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高交会也是如此。最初最难的工作便是招商。尽管主办方付出巨大努力，但首届高交会，也仅有5个外国政府组团、21家跨国公司参会。

17年后的今天，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高交会也早已今非昔比。如今的高交会已然从深圳走向世界，成为全球范围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新技术盛会。例如今年，就有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9个国外团组参展。其中，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等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9个团组及巴基斯坦为首次参加高交会。数百家外国展商为本届高交会带来了千余个项目与产品，此外，韩国也组织了8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参展，规模较去年增大一倍。

截至目前，已累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逾5000家次的境外企业参加过高交会，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此论道，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高交会长论坛上发表高见，包括全球十大证交所在内的著名海外证券交易机构前来“跑马圈地”、发掘中国好公司。如果说，初期深圳高交会是位“愁嫁女”的话，那现在她已经变成了“万人迷”。

8年前，高交会海外分会首次走进西班牙巴塞罗那，只有十几家企业前来

合作。在2014年第二次巴塞罗那的高交会海外分会上，超过240家西班牙企业在高交会海外分会上争相“追”着中国企业跑，西班牙巴塞罗那电视台甚至全程跟踪采访。

今年高交会海外分会则首次走进了俄罗斯，受到当地科技界的热切关注与积极参与。来自俄罗斯联邦超过25个地区近50家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科技公司的150多位代表前来参加分会，与中方企业进行了超过了150场次的对接洽谈。

高交会海外分会自2005年起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芬兰、匈牙利、德国和以色列等国家举办，在欧洲大地不断刮起一阵阵“深圳旋风”，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魅力。

再例如，2011年第十三届高交会上，国际知名半导体专家大见中弘出现在现场。这位年逾七旬的业界泰斗，素闻深圳正在上演一场“科技盛宴”时，便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不请自来地从日本来到高交会上，并由衷地感叹道：“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展会，科技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 “新技术”对接“新资本”

深圳的“性格”当然也影响着高交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资本市场最为完善的地方之一。因此，从诞生那一刻，高交会就将打通技术与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壁垒为使命。

在高交会上，许多市场规则被重新“洗牌”，由于突破了传统体制的限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安徽省天长市秦栏镇1999年首次参展高交会，就把自己的电子产品卖到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高交会的培育，秦栏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电子镇，仅电子遥控器的出口就占全国总额的70%，曾创造了闻名全国的“秦栏神话”。

一边是科技界的“年度大集”，一边是满世界寻找项目的风险投资机构。在高交会这个舞台上，造就了许多科技与创业资本融合的佳话。

风险投资一直是高交会上颇为独特的风景，不少参展企业发现，高交会上不仅能卖产品、卖技术，甚至还能卖股权。在很多人尚不知风险投资为何物时，首届高交会就前瞻性地引入风险投资，提出科技成果交易和风险资本结合，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创造条件。

深圳本斯集团张滨对此深有感触。10多年前，从美国归来的他带着柔巾机技术，匆匆赶赴高交会，获得了一个仅4平方米的展台。虽然展台面积不大，但柔巾机技术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一方面获得风投解决资金之缺，另一方面也一口气拿到了5000万元订单，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家电细分产业的小巨人，目前已拥有4家企业。后来，他又在高交会上得到一个国内著名的风险投资商的青睐，投资1亿多元帮助他打造一个新的担保公司。如今的他再逛高交会，任务已经从以前的找投资，变成了如今的找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10多年来，全国近300家企业借高交会平台成功上市。而正是因为与高交会的相互促进和发展，目前深圳已成为全国创业最活跃、竞争力最发达的地区，创投机构的数量和管理创业资本额占到全国的1/3。



图为参会者正在介绍自己的最新成果。

# 当“文化”遇上“科技”

## ——“2015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

谢仁敏 朱芳 赵鹏飞



图为论坛现场，嘉宾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国家战略如火如荼深入推进之际，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2015文化科技创新论坛”近日隆重举行。据悉，本届论坛以“开创新背景下的文化科技融合”为主题，分设“协同创新与未来发展”、“创客经济与社会变革”、“开源创新与公共文化”和“创客与创新管理”四个单元。来自美、澳、荷、法、加拿大及中国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文化企业代表百余人齐聚本论坛，就文化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那么，这场精彩的论坛又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呢？

### 观点一：协同创新成趋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平指出，我们需要确立一种“集成创新”的理念，强调自主意识、跨界意识、协同意识和整合意识，有效实现艺术要素与技术要素的集成和创新。

### 观点二：深圳创客空间大

美国未来学院“十年预知”项目研究主任琳·杰弗雷对深圳格外关注。在她看来，很多旧金山的创客来到深圳，于2007年创办了开源式制作工厂。中国深圳是未来创客孵化的重要区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科技，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命题。那么，科技如何影响文化的走向？”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昌勇指出，文化趋向综合化发展将打破诸多界限，实现跨界融合发展，并将对当代艺术、先锋艺术、大众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指出，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以文创为代表的文化创新代表了人们的不同需求，文化、情感、服务、技术、材料等都被整合在一起。未来，更多的小微企业和虚拟型企业将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即一源多用或多源多用，进而最终形成真正的“互联网+”文创生态。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设计总监叶长安展示了香港在社会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果。他认为，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重要，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跨界合作是必然趋势。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约翰·哈特利则说，创客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技术、知识和经济等因素的沟通，通往创意经济与文化的新道路就在我们的文化、生活、环境等整个生态系统之中。

“华强北之所以受到创客的青睐，缘于其打造了一个为创客们提供全产业链条的创业生态雏形，缩短创客创意变成实物、产品的周期。”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负责人李诺夫表示，“山寨2.0就是创新。”深圳已走过模仿、集成、改良再创新的道路，未来的创新之路将更加自信。

### 观点三：鼓励包容促创新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马志辉则强调了创意的文化公益性。马志辉称，创新和创客并不总带来经济回报，很多开源方面的创新源自内在好奇心的驱动和执着。同时，社会与政府则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通过重视过程与宽容失败来推动创意的发展。

上海市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一直都很关注创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花建表示，创新城市不仅仅依赖于大城市，更要形成区域联动效应，带动小城市的发展，形成“分散式集聚”，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梯度结构的、有效的城市网络。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媒介文化与创意艺术学院国际部主任李士林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科技融合需要更多地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对新事物的诠

释要有弹性机制，达成公共部门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调解与平衡。

### 观点四：优质管理不可缺

在讨论如何对待创意时，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斯蒂芬·波伊乐提到，创意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好创意，真正把创意转化为创新产品。政府要建立一种创新机制，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并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创新金点进行有效管理。

KEA欧洲事务所创始人菲利普·科恩梳理了欧美的创新管理经验。他提醒说，政策制定者清楚了解面对何种挑战是一个难点，如何落地实施又是一个难点，这需要采用多维度的综合创新。“比如，推动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培养创意人才，提供创新土壤，同时也带动了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他说。

深圳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朱谢群分析了从创意的兴趣导向到创业的利润导向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知识产权角度提供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在法律规范上，创意权益归属界定中存在的困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詹双晖则针对管理政策面临的难题提出了三条对策：一是政策制定时应注重解决普遍性问题；二是推进文化产业与科技、制造业及经营模式的融合创新；三是努力培育创新文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